

西巫拉帕《画中情思》中的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  
On the Ethical Identity and Ethical Choice  
in “Behind the Painting” of Sriburapha

宋帆\*

**摘要：**西巫拉帕是泰国现代文学奠基人，其代表作《画中情思》是一部有着清晰伦理结构的作品，小说描写主人公吉拉娣因伦理身份的错位而陷入多重伦理困境，而她在当时的伦理环境下所做出的伦理选择带来的却是爱情婚姻悲剧。作者由此表达了对封建宗法制度的压抑人性的伦理观和资产阶级扭曲人性的伦理观的双重否定，以及对崇尚人性真实和理性基础的婚姻爱情伦理观的诉求，使该作的伦理教诲特征由此得以凸显。本文以中国当代著名学者聂珍钊建构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为依据，分析《画中情思》的主要人物的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揭示作品的伦理结构和作者的伦理观。

**关键词：**西巫拉帕 伦理身份 泰国现代文学 画中情思

**Abstract**

Sriburapha is the founder of modern literature of Thailand. There is a clear ethical structure in his representative work, Behind the Painting. Kirati, the heroine in the novel, always unconsciously falls into multiple ethical predicaments because of the misplacement of her ethical identity. Her ethical choices made in the ethical environment at that time did not make any sense but only brought about the tragedy of love and marriage. The author thus aimed to present his protest against the ethical view of the feudal system which distorted human nature. Through this novel, Sriburapha appealed for the love and marriage ethics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rational found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thical propagation of this novel were then highlighted.

**Keywords:** Sriburapha, Ethical Identity, Ethical Predicament, Modern Literature of Thailand, Behind the Painting

---

\* Schoo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1620,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Email: 788805@qq.com

西巫拉帕（1905-1974）原名为古腊·柿巴立，是泰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对泰国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可以说，西巫拉帕在泰国的文学地位不亚于中国文坛的鲁迅先生。” [1] 《画中情思》（创作于1937年）作为西巫拉帕的代表作之一，是泰国家喻户晓的经典文学作品，它“标志着泰国乃至整个南亚、东南亚地区现代文学的进步”。 [2] 对于这部小说，中国及国外评论者大都采取社会历史批评视角下的解读路径：认为这部作品通过描写贵族妇女吉拉梯的爱情悲剧，体现了深刻的反封建主题（李健：2007） [3]，体现了“吉拉梯所代表的贵族阶层的衰落和旧时代的结束，以及旧时代与男主人公代表的新时代之间的冲突，”（泰国：班忠·班哲信：1981） [4] 也有学者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对吉拉梯这个贵族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探讨，认为吉拉梯的悲剧是一种女性“觉醒者的悲哀”，虽然吉拉梯追求爱情，但在宿命论支配下的软弱和矛盾的性格是造成吉拉梯悲剧的根本原因。（易朝晖，2003） [5] 有泰国学者从精神分析批评角度认为男女主人公的自恋情结是导致爱情悲剧的原因。（科尼塔·西提：2008） [6] 或从语言学角度进行文本分析，认为男女主人公的言语交际局限性是造成爱情悲剧的主要原因，并认为女主人公的悲剧与阶级和社会无关，女主人公受当时西方文学影响，追求中世纪西方贵族的“典雅爱情”模式。 [7] 这些研究对解读《画中情思》有着重要意义。然而西巫拉帕作为泰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对他的作品研究仍然过少。尤其是在中国，虽然《画中情思》早在1982年已经翻译成中文，但对这部作品的相关研究文章仅有五篇。

### 1. 人性的压抑：封建宗法制度下的伦理悲剧

在过去的几年里，由中国学者聂珍钊建构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学批评在中国悄然兴起，“这在很长时间来西方文学批评话语绝对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它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内学界文学批评在西方学界的某种失语状态，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新的探索方法和途径。” [8] 然而在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泰国文学上，目前仍然是空白。如果我们引入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来解读这部作品，我们便会发现，吉拉梯的悲剧源于其伦理身份错位及由此引发的各种伦理困境，吉拉梯在伦理困境中做出的伦理选择一步步引向爱情婚姻的悲剧，作者由此表达了对封建宗法制度的压抑人性的伦理观和资产阶级扭曲人性的伦理观的双重否定，以及对崇尚人性真实和理性基础的婚姻爱情伦理观的诉求。

在分析文学文本的伦理结构的时候，我们需要理清文本的伦理线。依据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伦理线即文学文本的线形结构。在通常情况下，伦理线属于文学文本的纵向结构。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观点看，几乎所有的文学文本都是对人类社会中道德经验的记述，几乎所有的文学文本都存在一个或数个伦理结。伦理线的作用就是把伦理结串联起来，形成错综复杂的伦理结构。在文学文本的伦理结构中，伦理线的表现形式就是贯穿在整个文学作品中的主导性伦理问题。”（聂珍钊：265）[9]《画中情思》围绕着贵族女子吉拉娣的一生追求爱情的伦理选择展开，构成这部作品的伦理主线。

“在文学文本中，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聂珍钊 263）。因此，分析这部作品的伦理主线，应先从主人公吉拉娣的伦理身份入手。在《画中情思》这部作品中，吉拉娣经历了伦理身份的三重转换，其伦理身份的错位导致主人公陷入伦理两难，而主人公在当时的社会伦理环境中不得不做出的痛苦的伦理选择并不能使她摆脱命运的不幸，反而使她一步步走向爱的理想的幻灭和生命的终结。

吉拉娣的第一个伦理身份——贵族之女。她出生于泰国一个贵族家庭，祖父为泰国亲王。其父亲竭力想要使自己的子女象他一样成为王公，不让吉拉娣和外界发生联系，仅让她出入王室内宫。吉拉娣在这种封闭式生活中葬送了她的青春年华。这不仅因为她受到正规的传统教育，恪守孝道，而且因为她长得美，吉拉娣说：“我很幸运，生来很美，然而又很不幸，注定终生得不到爱情。这也许正是因为长得美的缘故吧。和妹妹相比，可以说我是过着幽禁的生活的，完全被排斥在现实生活之外，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画中情思 74）。最初，吉拉娣对这种伦理身份是认同的，因为她并不懂得思考。“当时我什么都没有想过，因为人们并不想把我培养成为会思想的人。”（73）然而，这种生活方式并不符合她的纯真热情的天性，越来越让她感到乏味。她不甘于孤独和无所事事，选择学习艺术，阅读从洋教师那得到的英文书，这使她更加懂得思考，更加唤起她内心对爱和美好的追求，加深了她的孤寂感。她说，“我爱美的东西，因为美的东西能激起我的美感和喜悦，它没有污秽，不会让人觉得压抑。”（65）这种痛苦和孤独在她的两个妹妹出嫁后日益加剧了。妹妹的出嫁使她意识到了可怕的青春的流逝。她逐渐陷入一种伦理困境，虽然内心深处渴望自由和爱情，但又难以摆脱这种伦理身份的束缚，她是孤立无援的，即便是洋教师整天讲的也是什么“功德、贤妻良母”之类的东西。她

只能选择遵循当时父权社会的伦理规则：恪守孝道，服从父权。但她并没有放弃追求爱的努力，小说中写到她不惜每天花几个小时美容。吉拉娣这么做并不是为了追求虚荣，而是渴望留住美好，留住青春，渴望有朝一日爱的光顾。在她看来，青春是爱的基础。而当时的社会价值观也认为女人生来最大的义务是用自己的美貌“点缀这个世界”，（74）吉拉娣深知：“女人一旦失去了美色，高尚的品格也会被忽视。”（74）

然而，青春一点点无情逝去，吉拉娣 35 岁的时候，仍然过着几乎与外界社会隔绝的生活，无形中被剥夺了恋爱的权利。作者通过对吉拉娣伦理困境的描述揭露封建宗法制度的伦理观扼杀美好、扼杀青春的残酷事实。

吉拉娣的第二个伦理身份——贵族之妻。在吉拉娣 35 岁的时候，年过五十的同样为王公贵族的昭坤向她父亲提婚。吉拉娣并不渴慕金钱和地位，这场婚姻完全不符合吉拉娣内心对婚姻的印象。虽然她的生活寂寞沉闷，但她思想活跃，对外部世界始终充满好奇，渴慕嫁给年龄相当，兴趣相投的男子，而不是“病弱，枯燥，乏味的人。”（63）然而昭坤的求婚却很可能是吉拉娣唯一一个摆脱孤独的深闺生活的机会。吉拉娣感到伤心，失望，但最终主动决定嫁给昭坤。这个决定并不意味着她对命运软弱的妥协，对爱情信念的背弃，而是她在当时那个伦理环境中所能做到的仅有的积极改变自己命运的方法。她说到自己出嫁的原因时说：“为什么要在衰颓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不肯回头呢？我渴望认识、熟悉、接触外部世界，急于改变生活方式，需要做一些不同于三十四年来每日必做的事情。除了结婚，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可以达到这一目的。生来不曾得到爱情已经是我的极大不幸了，难道闭起眼睛、拒绝一切可能使生活变得丰富一些的途径就聪明吗？”（75）从这段话我们看出，在当时那个社会条件下，吉拉娣没有别的选择，她明确地知道自己的伦理身份是不可能给自己带来幸福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等待自己的只会是一生的自我封闭。因此她毅然决定摆脱压制自己并扼杀青春和爱的伦理身份，接触外面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吉拉娣接受没有爱的婚姻，并不是对爱的理想的背弃，而是对自由的追求。

“由于身份是同道德规范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身份的改变就容易导致伦理混乱，引起冲突”（聂珍钊 257）。伦理身份的转变，一方面提升了吉拉娣的自由，使她终于得以接触外面的世界，但却赋予了“妻子”的伦理责任和道德束缚，限制了她的感情选择的自由，带来了更大的伦理冲突。她知道昭坤并不爱她，娶她的目

的是“追求享受”和所谓的安逸的幸福生活。吉拉娣努力认同自己新的伦理身份，和年老乏味但却“好心”的丈夫和睦相处，把握自己从婚姻中得到的有限但却实实在在的幸福。然而在她的个性中，追求爱和美的火焰没有被完全扑灭，“青春”这爱的基础并没有完全消逝，这仿佛也注定她和男主人公诺怕朋的相遇相爱。婚后的昭坤带吉拉娣来到日本度蜜月，请朋友的儿子、当时在日本攻读金融专业的留学生诺怕朋当导游，吉拉娣也因而结识了诺怕朋。

22 岁的诺怕朋几乎对美丽的吉拉娣一见钟情，甚至以为她绝不超过 30 岁。随着交往的增多，他们越来越了解彼此。使得他们彼此心灵更靠近的是因为他们总是有着说不完的共同话题，他们都热爱大自然，都有追求爱的情感和渴望。诺怕朋起初以为吉拉娣是内敛而严肃的，然而他渐渐发现吉拉娣是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纯真热情的女子，“每当高兴起来，她就纵情大笑，她的笑声里充满着生活的乐趣，和孩子般的纯真。”“这种清脆、嘹亮而又能够引起共鸣的笑声必然会长久地萦绕在听者的心际。”（60）他们常常有共同的观点，例如文中写到他们在咖啡馆前看到几个举止随便的女招待和喝醉的酒徒勾肩搭背走过，吉拉娣当即对这种社会风气表示了反感，获得了诺怕朋的赞许和认可。他们心中都厌恶爱情缺位下的空虚堕落，渴望真实的爱。因此，除了身体的吸引外，伦理观的共鸣也是他们爱情产生的基础。诺怕朋发现吉拉娣除了看上去年轻动人外，还是他见过的“最温柔，体贴和聪明的女子”，这使他一往情深地爱上了吉拉娣。但他心中有个心结，就是对吉拉娣嫁给年龄相差悬殊的昭坤的原因感到好奇，希望吉拉娣能揭开这个谜底。诺怕朋的追问实际上是想探知吉拉娣的真实感情世界。在山鹰游览的时候，吉拉娣终于对他敞开心扉，讲述了自己孤独的青春和没有爱情的婚姻。对诺怕朋来说，当他得知吉拉娣并不爱自己的丈夫，伦理心结已经打开，而一时间热烈的爱情使他失去理智，他情不自禁地吻了吉拉娣，并向她大胆表白了自己的爱慕，渴望吉拉娣同样报以爱的回应。

身为贵族之妻的吉拉娣，陷入新的伦理身份带来的巨大的伦理两难。她内心同样深爱诺怕朋，这份爱也是她等待了 35 年的宝贵感情，然而她无法逃避婚姻带给她的伦理责任。她的伦理选择是拒绝和诺怕朋进一步发展感情，也不肯对诺怕朋表达自己的真实感情。她还请求诺怕朋别犯傻，面对现实，忘记自己。

诺怕朋始终没有得到吉拉娣的示爱，即便在吉拉娣和昭坤离开日本回国时他们互相道别的最后时刻。诺怕朋继续六年的日本求学生涯，而吉拉娣则继续呆在那没有爱情的婚姻牢笼里。

泰国和中国学者在分析女主人公形象时多认为吉拉娣是逃避现实而胆怯懦弱的，不敢违背封建宗法制度的道德条框，不敢表达自己真实的感情，这是造成吉拉娣的爱情悲剧的根本原因。（第利欣·本克庄：2003）[10] 这是基于当代社会伦理环境的人物评价，但文学伦理学批评是历史主义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主要运用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文学中的道德现象，倾向于在历史的客观环境中去分析、理解和阐释文学中的各种道德现象。”在回到历史现场，还原了当时的客观伦理环境后，我们认为，以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伦理观念和婚姻家庭观为立场来分析，是符合其伦理身份的伦理选择，并不是出于懦弱。对当时的社会来说，贵族妇女离婚或者出轨是不可接受的极端事件，而两人之间的年龄差距也是不可忽视的障碍。吉拉娣的伦理选择有着其必然性，也形成了她此后身上解不开的伦理结。“我是围着太阳转的，自己无法选择，只能由太阳决定”——吉拉娣此话所说的太阳，表面上是指昭坤，实际指的是当时她无法选择的伦理环境。她对诺怕朋说，“如果我们俩在山鹰岭上生活一辈子，你的话就是正确的。但事实上，再过一会儿，我们就要下山回到人群中去。”（76）吉拉娣之所以仍然坚守自己的伦理身份，另一层原因更是出于她的道德理性。她不想伤害“好心的”昭坤，更不愿意诺怕朋因此而无法继续学业，葬送自己的大好前程。吉拉娣毅然拒绝了憧憬了35年之久的爱情，需要何等理性意志力。她是智慧的，对自己的伦理身份和社会环境有深刻的认知，从她的身上，体现了一种道德的光辉和对爱的理解：爱是无私的奉献，是利他的，是伦理责任的担当。

实际上，吉拉娣是一个坦率真诚的人，是敢于暴露自己的真实内心的。她在和诺怕朋敞开心扉谈论自己的婚姻的时候曾说过：“诺怕朋，你千万别以为这样坦率地剖白自己的感情是件丢人的事情。爱情是值得赞美的，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如果说胆怯的话，我们可以把诺怕朋的性格也解读为胆怯。他说：“理智告诉我，不能向任何人吐露自己对蒙拉查翁·吉拉娣——我父亲的朋友的妻子——的热恋。”因此，如果我们从伦理视角去解读作品，我们发现吉拉娣和诺怕朋的悲剧并不是性格悲剧，而是由当时的社会伦理观决定的。

由于这部作品以男主人公为第一人称写作，目前中泰学者对这部作品的研究往往重点集中于分析女主人公吉拉娣这个文学形象，而往往忽视对男主人公形象的深刻分析。笔者认为，小说中的诺怕朋是一个复杂立体的人物形象。在小说中他的道德世界得到多方位呈现。他渴望能与吉拉娣相爱，但和吉拉娣有着不一样的伦理价值取向。他认为真实的爱是不需要受道德和理性的束缚的。“我只知道在爱情的支配下干的事情，虽然有些不道德，但也是符合自然规律的。”（77）另一方面，他对这场爱情也是混乱而迷惑的，他并没有打算对这场爱情坚持到底，并没想把吉拉娣从昭坤身边夺过来，“首先，我还在求学，眼下的处境不允许我那样做。其次，昭坤是我敬重的人。再说，我没有足够的勇气去了解蒙拉查翁·吉拉娣愿不愿意为了我的爱情和需要，或者也包括她的爱情和需要，抛弃她的名誉和地位。”（77）因此，诺怕朋对吉拉娣的爱情具有以下的特点：（1）诺怕朋的爱含有更多的兽性因子或非理性因子，小说大篇幅地描写吉拉娣的外表如何打动了诺怕朋，使他心猿意马。他的爱情更多的表现为对女性美丽外表的迷恋和冲动，但他并没有真正理解吉拉娣，也并不真正了解自己的爱。吉拉娣临终时对诺怕朋说“你什么都不明白，什么都没明白，甚至连自己是怎么回事也不明白。”与吉拉娣的敏感和智慧相比，他是迟钝的。（92）（2）诺怕朋的爱是只企图把握现在而逃避伦理责任的。即便是他得到了诺怕朋的爱回应，他也是软弱而逃避的，没有勇气担当的。（3）诺怕朋的爱有更多的功利性，他认为爱是要求回报的，他一再追问吉拉娣是否爱自己，追求爱带来的心理满足感，他对吉拉娣是否会为他付出名誉和地位甚至是不信任的。因此这种爱情也是难以始终如一的。（4）诺怕朋的爱是缺乏诚信的。吉拉娣从不隐瞒自己的任何事情，包括自己的年龄。然而诺怕朋一直隐瞒了他有未婚妻这样一个事实，甚至认为这“无关紧要”。直到六年之后，诺怕朋和未婚妻打算成婚的时候才告诉了吉拉娣。诺怕朋向吉拉娣承诺永远不会忘记她，然而并没有做到。

如果说吉拉娣的第一次的伦理选择是为自己的幸福作打算，那么吉拉娣这第二次的伦理选择则是为了所爱的人，她决定为了爱人的前途放弃对爱的追求。然而吉拉娣放弃的只是诺怕朋，却并没有放弃对诺怕朋的爱，她一生更大的悲剧也由此展开。

## 2. 人性的冷漠：买办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伦理悲剧：

“伦理两难是难以做出选择的，一旦做出选择，就往往导致悲剧”，（聂珍钊 268）。使得吉拉梯陷入真正致命的伦理困境的正是吉拉梯的第三个伦理身份：——贵族富孀。

吉拉梯回国后，诺怕朋继续在日本求学，并在日本银行工作了一段时间。从一个接受日式教育的留学生变成了资产阶级买办。对诺怕朋这个人物的伦理身份的分析应该联系当时的社会环境。当时的泰国称为暹罗，其经济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打上了半殖民地的烙印，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供应地，商品推销地和资本投资场所。继英法之后，日本也于 1927 年成立“日暹协会”。企图打入暹罗市场。日俄战争结束时，日暹贸易额每年不过 23 万日元，而到了 30 年代增加到了 1684 万日元。在三十年代的泰国，依赖国外商品的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十分发达，却没有自己的工业基础。本国民族工业由于资本短缺，严重依赖外国银行和与外国银行有直接联系的高利贷资本。这种形势下催生了买办资本家阶层。[11] 买办资本家的目的是赤裸裸的攫取利润。诺怕朋学的银行专业在当时是适应买办阶层这种需要的。诺怕朋的伦理观和价值观，也具有买办资产阶级伦理观的特点。这种伦理观是功利主义的和冷漠的。诺怕朋对爱的信念并不坚定。当感到心情烦乱时，他选择的是去自己曾鄙视的咖啡馆寻欢作乐麻痹自己。与吉拉梯分别后，他很快便不那么思念吉拉梯了，到了第二年，诺怕朋只给吉拉梯写过三封信。诺怕朋自述其原因的时候称一是因为吉拉梯始终没有明确向他表示，二则是因为此后自己专注于事业之路。诺怕朋渐渐的认同了自己的新的伦理身份，接受了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伦理观，认为爱情是人生无关紧要的事情了。他感觉“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仿佛一个时代结束了。现在，摆在我面前的事业和个人生活就是我在人生道路上的新起点。事实上，我已不再会有六年前的那种充满了深沉而热烈的感情了。”

半年之后，吉拉梯告诉诺怕朋昭坤病故的消息。此时的诺怕朋甚至对这个消息无动于衷。六年后，诺怕朋回到了泰国，受到了家人和未婚妻的热情迎接。诺怕朋为自己新的伦理身份而感到满意。“我在回到曼谷之后第一个早晨的得意劲头实在难以描述。想到当时的情景，我只能说，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快乐的一天。”此时的诺怕朋的幸福快乐已经与爱情无关了，只与社会地位和事业成功有关。



在昭坤病故后，吉拉娣伦理身份发生了变化。虽然她感受到了诺怕朋对她的日益冷淡，但新的伦理身份使她开始心存幻想，拒绝了其他人的求婚。得知诺怕朋回国后，她的内心燃起了渴望。在迎接诺怕朋的时候，她特意穿上了当年他们第一次见面穿的蓝底白花的衣服。她不仅希望借此对诺怕朋大胆表白情谊，也渴望唤回诺怕朋的热情。然而她遭遇的却是一个冷血的诺怕朋。虽然她美丽依旧，但没有了爱情的诺怕朋在功利的权衡之后的选择只能是父亲安排给他的门当户对的未婚妻。表面的相聚喜剧实质却蕴含着吉拉娣所无法承受的悲剧，造成这个悲剧的是心灵的疏离，而不是空间的相隔。吉拉娣说：“这不是分别的唯一原因，而且更不是造成悲剧的根源。”

当诺怕朋告诉吉拉娣自己将要和未婚妻结婚的消息时，吉拉娣感到有些惊讶，问他为什么要选择没有爱情的婚姻，诺怕朋说到：“在婚姻问题上，我无理想可言。”（89）吉拉娣发现诺怕朋已经变了，不像从前那么纯真的了。吉拉娣对爱的伦理观是爱应该始终如一，以生命来坚守。正如她和诺怕朋在日本分别的时候，诺怕朋最后一次问她是否爱自己，她没有明确回答，只说到“我和你是生死之交。”然而六年后她遭遇的却是诺怕朋对承诺的爱的彻底背弃，这使她无法承受。诺怕朋订婚后，本来病快好了的她却一病不起，最终与世长辞。临终诺怕朋来看她时，她精心打扮了一番，仿佛不曾重病的样子。她赠送了一幅画给诺怕朋作为新婚礼物，这幅画画着他们在山鹰游览的情景。诺怕朋终于明白了她的心。吉拉娣用极为细微的声音说道：“你的爱情在那里萌发，也在那里消逝，但另一个人的爱情却在行将崩溃的躯体内熊熊屏烧。”（93）。

吉拉娣三重伦理身份的转变使她陷入不同的伦理困境，导致了三重悲剧。而最后一重的悲剧是致命的，她发现她所坚守的爱的伦理是与当时的现实是矛盾的，她所追求的爱情理想是永远无法达到的，即便她的伦理身份使她获得了爱的权利。她做不到放弃自己对美和爱的伦理信念，只能选择死亡。伦理观的冲突导致了根本性的悲剧。她的人生是封建贵族伦理观和资产阶级伦理观的牺牲品。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要了纸和笔，写下一句话：“我死了，没有爱我的人：但是我感到满足，因为有了我爱的人。”这句话意味深长，有学者解读为这是吉拉娣的“精神胜利法”，反映了旧贵族阶层的思想，他们不愿面对现实，甘愿沉浸在剥削体制里曾经辉煌的过去的世界。（班忠·班哲信 1982）[12] 但从吉拉

梯对爱的一生的追求来看，这句话是表达了吉拉梯对爱的信念和伦理理想的坚守。虽然在她心中那个热情纯真的诺怕朋已经不存在了，但她已经不计较爱的得失了，她坚持的是实现自我的“爱情自觉”精神。对于吉拉梯来说，用生命去捍卫了爱是她最终获得的唯一的满足和幸福。她认为“爱情可以给生活带来痛苦或种种不幸，但是真正感受到爱情的温暖的人，心里应该永远是甜滋滋的，永远充满着柔情蜜意。”（68）在悲剧面前，吉拉梯没有选择怨恨，“人可能是残酷的，但世界是可爱的，不是吗。”（75）在当时的伦理环境中，执着追求美好和爱情的吉拉梯的一生注定是悲剧的。“在那个时代，我的真正幸福是虚无缥缈的，我只是在追求、在憧憬、在期待。”作者对吉拉梯的爱情伦理观给予了赞美和肯定，也深刻揭露了个人悲剧的社会根源。

悲剧并不是只属于吉拉梯。对诺怕朋来说，即便他最终懂得了吉拉梯的心，很快他又会适应新的没有爱情的婚姻生活。他的功利主义使他成为一个富有的人，但他的人生只有满足而没有幸福的爱情，他也继续对自己新婚妻子隐瞒自己和吉拉梯的故事，过着演员一样的生活。正如小说伊始所描述的那样，他不敢把这幅画挂在客厅里和卧室里，那里只挂着价值高昂的名画，他只有在他一个人独处的工作间里才敢面对自己的过往。他的新妻子最多会偶然问起这幅画，何况她“对自然景致不感兴趣”，更不要说关心他的精神世界了。这不能不说是另一个悲剧的人生的开始。

“画”定格了过去的记忆，也象征着过去的结束。吉拉梯虽然死去了，但她有自己爱的人，而对于诺怕朋来说，不仅失去了爱他的人，也不会再懂得爱的意义了。扭曲人性的资产阶级的伦理观也葬送了诺怕朋的真正幸福。

### 3. 人性的真实：《画中情思》的伦理教诲和伦理诉求

“文学产生的目的就是源于伦理表达的需要，文学的功能就是教诲”（聂珍钊 142）西巫拉帕通过对吉拉梯个性与命运冲突的悲剧的描述，使吉拉梯这个人物形象上升到高度概括的高度，变成了一个鲜明的艺术典型。作者对吉拉梯这个人物给予了深刻同情，在她身上凸显了作者的伦理诉求，即肯定人性的真善美，推崇理性的婚姻爱情观，赞美对爱 and 美的不懈追求，指出爱情是婚姻幸福的基础。然而，由于“爱情是有社会性的，实际关联着一整套价值体系和伦理标准”，在那个时代，这种爱情伦理观与当时的价值体系是矛盾的，因此只能是一场悲剧。作品的伦理教诲特征由此得以凸显。作者不仅批判了封建制度下的婚恋观对人性的压抑和对幸福

的剥夺，也鞭笞了资产阶级的新兴价值观影响下的婚恋观中的利己性和软弱性。

“文学是否成为经典是由其伦理价值所决定的。”（聂珍钊 142）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泰国，《画中情思》的伦理探索深度和广度无疑是深刻的，这也是《画中情思》最重要的审美价值所在。

政治态度与伦理态度是不可分割的，西巫拉帕的伦理态度和伦理主张也体现了作者的政治态度。从文学的写作年代来看，《画中情思》这部作品作于 1937 年。1932 年，泰国爆发了民主革命，七世王被迫接受了君主立宪政体。皇权衰落，贵族地位下降，是这次革命的直接结果。但由于泰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革命很不彻底，很快与封建势力妥协，新权贵代替了老权贵，金钱成了社会地位的标志。革命也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13] 西巫拉帕对资产阶级革命感到失望，他曾说“使民主制度消亡，还是存在下去，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14] 西巫拉帕此前的早期作品，人物形象简单，表现社会较为肤浅，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对封建制度价值伦理观的否定和对资产阶级自由的向往。而在《画中情思》中西巫拉帕大胆表达了对资产阶级伦理观的否定，标志着西巫拉帕作品艺术性和思想性的新高度。1947 年，西巫拉帕在澳大利亚接触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学说。1950 年，泰国作家联合会掀起了“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的运动，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有了自己的文学。西巫拉帕积极投身这场运动并成为旗手。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他的另一部代表作《向前看》，但此后西巫拉帕受到政府的迫害，于 1952 年遭到逮捕入狱五年。

1958 年，他应邀率领泰国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其间泰国发生了军事政变。西巫拉帕为避免政治迫害，不得不留居中国，也为中泰友谊做出了贡献。1974 年 6 月 16 日，西巫拉帕因病于北京逝世，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送了花圈。西巫拉帕的一生，坚持不向金钱地位和任何恶势力低头，坚持为生活和人民写作。这也是西巫拉帕一生坚守的艺术创作伦理。

#### 4. 结语

西巫拉帕是泰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画中情思》是其早期重要的代表作，也是泰国家喻户晓的作品。这部小说于 1982 年翻译成了中文在中国传播，也为中国人熟知。泰国学者对其的研究虽然较多，但较少从伦理学角度去进行研究。而中国学者则侧重于从历史批评的角度对其思想内容进行评析和解读，认为该作品通过描

写贵族妇女吉拉梯的爱情悲剧，主要体现了封建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并多重点分析女主人公的性格，认为吉拉梯的胆怯和不懂抗争等个人性格是其悲剧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中国学者聂珍钊建构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在中国兴起，这种理论认为应该从历史的客观环境中去分析人物，理解和阐释文学中的各种道德和伦理现象，而不是站在基于当代社会伦理环境的制高点去评析人物。吉拉梯的悲剧并非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吉拉梯也并非是一个胆怯懦弱甘于命运摆布的贵族女性形象，而是一个执着于爱的勇敢而又善良的女性。吉拉梯的命运是她基于其不同时期的不同伦理身份作出的伦理选择。本文根据当代中国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体系，揭示全作品的伦理架构，从吉拉梯的三重伦理身份的切换入手，深入分析作品人物的伦理选择，挖掘该作品的伦理审美价值。

同时，本文通过在该理论框架下分析其另一男主人公诺怕朋后发现，诺怕朋的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带有买办资产阶级伦理观的烙印，其身上体现出受时代局限的道德伦理价值体系亦为造成爱情悲剧的重要成因。

基于系统的研究与分析，我们认为该作品不仅是一部反封建的作品，更是对当时资本主义伦理观的否定，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变更，聚焦于人性和伦理的刻画，揭露了社会伦理价值体系对人性的决定作用，从而体现出作者朴素的社会主义伦理观诉求和政治态度萌芽，是作者的个人文学史上一部具有转折意义的标志性的文学作品，作品对社会伦理探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这也是作品的重要价值所在。

## 参考文献

- Duan, L.S.H. 2014. [General History of Thailand]. Shanghai: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208-212.
- Huang, J.Y., Tang, X.Y. 2013. Taiguo Xiaoshuo Hua Zhong Qing Si zhong de Yishu fengge. [The Art Style of Thai Novel “Behind the Painting”].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Vol 3.
- Khanittha Sitthi. 2008. **The Study on Narcissism in Sriburapha’S Behind the Painting**. ChiangMai: ChiangMai University.
- Li, J. 2007. [**Thinking of Thai Literature**]. Beijing: World Book Publishing House. 8-159.
- Luan, W.H. 2014. Ruan Wenhua: Taiguo Xiandai Wenxue Shi. [**History of Modern Thai Literature**].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68-69, 106.
- Nie, Zh.Zh. 2014. Wenxue lunli xue piping daolu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Ethics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 Wang, X.Y. 1994. Dong Fang Wenxue Shi Tong Lun. [**General History of Oriental Literature**].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51-252
- Yi, Z.H. 2003. Juexing de bei ai ---tan hua Zhong qingsi nv zhuren gong Jiladi de xingge ke hua ji qi beiju chengyin. [The Sorrow of the Awakener --- O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Heroine Gillati in the “Behind the Painting” and the Cause of Her Tragedy]. **Essays on South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2003.
- Zhu, Z.W. Zhu Xiaoya. 2013. Zhongguo Wenxue lunli xue piping de fasheng yu kenta. [The Occurrence and Reclam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Ethics Criticism].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2: 98-105.
- ชูศักดิ์ ภัทรกุลวณิชย์. 2540. “ปริศนาข้างหลังภาพของ ‘ศรีบูรพา’” **สารคดี** 13 (151 เดือนกันยายน).
- บรรจง บรรเจิดศิลป์. 2524. **ดูสังคมจากวรรณคดี ดูวรรณคดีจากสังคมศิลปะวรรณคดีกับชีวิต**. กรุงเทพฯ: สำนักพิมพ์สายทิพย์.
- ตรีศิลป์ บุญขจร. 2546. “‘ศรีบูรพา’ กับพัฒนาการนวนิยายไทย”. **ภาษาและหนังสือ** ปีที่ 35

